

编委会主任：雷春美 张燮飞 王光远 李祖可 ○

总主编：苏文菁 ○

闽商发展史 ○

• 香港卷 ○

王日根 林 枫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总 主 编： 苏文菁
副总主编： 许 通 陈 幸 曹宛红 李道振 谢小燕

闽商发展史

• 香港卷

本书为2010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闽商发展史》（2010Z004）的结题成果

王日根 林 枫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商发展史. 香港卷/王日根, 林枫著.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615-6128-7

I. ①闽… II. ①王… ②林… III. ①商业史—福建省②商业史—香港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0741 号

出版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薛鹏志 章木良
装帧设计 李夏凌 张雨秋
责任印制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ress@126.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开本 889mm×1194mm 1/16
印张 13.75
插页 4
字数 320 千字
印数 1~2 000 册
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闽商发展史》

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

编委会主任：雷春美 张燮飞 王光远 李祖可

编委会副主任：翁 卡 臧杰斌 王 玲 张剑珍 陈永正

编委会成员：

陈爱钦	陈春玖	陈 飞	陈国平	陈建强	陈鉴明	陈景河	陈其春
陈秋平	陈少平	陈祥健	陈小平	邓菊芳	冯潮华	冯志农	傅光明
郭锡文	洪 杰	洪仕建	胡 钢	黄海英	黄健平	黄 菱	黄如论
黄 涛	黄信焜	黄忠勇	黄子曦	江尔雄	江荣全	景 浓	柯希平
雷成才	李海波	李家荣	李建发	李建南	李 韧	李新炎	连 锋
林国耀	林积灿	林荣滨	林素钦	林腾蛟	林 云	林志进	刘登健
刘用辉	欧阳建	阮开森	苏文菁	王亚君	王炎平	翁祖根	吴国盛
吴华新	吴辉体	吴泉水	徐启源	许连捷	许明金	杨 辉	杨仁慧
姚佑波	姚志胜	游婉玲	张琳光	张轩松	张祯锦	张志猛	郑玉琳
周少雄	周永伟	庄奕贤	庄振生				

专家指导组成员：

苏文菁 徐晓望 王日根 唐文基 王连茂 洪卜仁 郑有国 罗肇前
黄家骅

总 主 编：苏文菁

副总主编：许 通 陈 幸 曹宛红 李道振 谢小燕

总 序

闽商是孕育于八闽大地并对福建、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巨大贡献和影响的商人群体,是活跃于国际商界的劲旅,是福建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千百年来,为了开拓新天地,闽商奔走四方,闯荡大江南北;漂洋过海,足迹遍及五大洲,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他们以其吃苦耐劳的秉性,超人的胆略,纵横打拼于商海,展示了“善观时变、顺势有为,敢冒风险、爱拼会赢,合群团结、豪爽义气,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闽商精神,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盛世修史,以史为鉴,利在当下,功在千秋。为了不断丰富闽商文化内涵,更好地打造闽文化品牌形象,持续提升“世界闽商大会”品牌价值,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进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我们把《闽商发展史》研究编纂工作作为闽商文化研究的重大工程,并于2010年8月正式启动。《闽商发展史》全书十五卷,除“总论卷”之外,还包含福建省九个设区市,港、澳、台、海外以及国内异地商会分卷,时间上从福建目前可追溯的文明史开始。2013年6月,我们在第四届世界闽商大会召开前夕出版了《闽商发展史·总论卷》,并以此作为献给大会的贺仪。今天,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还带着淡淡的油墨芳香的是《闽商发展史》各分卷。《闽商发展史·总论卷》和《闽商发展史》各分卷都是《闽商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商发展史·总论卷》的总论注重闽商发展历史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设区市卷和港、澳、台、海外、国内异地商会卷侧重展示闽商发展历史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以丰富的史料与鲜活的案例,为福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文化建设增添了厚实的基础,为中国海洋文化、商业文化建设提供了本土的文化基因。

欣逢伟大的时代,是我们每个八闽儿女的幸运;实现伟大的梦想,是我们每个八闽儿女的责任。今后,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深入开展闽商文化研究,以闽商文化研究的优秀成果激励广大闽商,引领弘扬闽商精神,让广大闽商更加积极主动地把爱国热情、创业激情和自身优势转化成实际行动,融入“再上新台阶、建设新福建”的伟大实践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中共福建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 雷春美

前 言

《闽商发展史·香港卷》全面叙述了闽商在香港发展的历史。早在宋元时期,闽商便发挥其善于航海的特长,扬帆海路,进入香港。在宋代,香港地区的航海事业已较为发达,福建等地沿海渔民登户南迁来港渐多,他们大都仍操旧业,以航海渔捞为生,并带来了原有的宗教习俗。此时九龙半岛的航海业已经比较发达。据九龙蒲港岗村《林氏族谱》记载,宋时福建莆田一个名叫林长胜的,举家迁往今日新九龙黄大仙附近的彭蒲围(即今日的大磡村)。一连几代靠行船为生,艚船往来于闽、浙、粤等地。一次,他的孙子林松坚、林柏坚驾驶艚船出海遇到飓风,船毁货失。他们两人力挽船篷,紧抱船上祭祀的林氏大姑神主,浮到东龙岛(南佛堂),安全脱险。他们认为这是神灵保佑,便在南佛堂修建了祭祀林氏大姑的神庙。林松坚的儿子林道义后来又在北佛堂修建了一座同类神庙。这个林氏大姑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天后。宋代林氏家族的迁徙史和本地区南北佛堂天后庙的修建,不仅反映了当时该地区航海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福建的民间信仰向香港移植及推广的过程。由此可见香港地区的民间信仰,多是从中国内地移植过来,自唐宋而历明清各朝,区内居民相继从邻近之广东、福建等地迁入,他们将其原居地之风俗及信仰,带入香港地区,其后再受当地自然环境及历史影响,因而孕育成今之民间信仰。

闽人的移入不仅极大地推动了香港早期经济的发展,丰富了该地区的民间风俗及信仰,而且为香港早期聚落的形成和扩大做出了巨大贡献。香港开埠前,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移民活动始于东晋。之后虽陆续有记载显示汉人移入香港地区,但都比较零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迁移,或是政府方面促成的被动移民。宋元时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居民开始大规模移入香港,“新界五大族”即是在这一时期迁入香港的。“新界五大族”即邓、文、廖、侯、彭五姓,作为较早迁入新界定居的汉人代表,因其影响力较大,故被冠以此称,且这一称号至今保留。

进入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英国纷纷进入香港,且后来居上,由于闽商早已建立起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并开辟了较广阔的市场,英国殖民者也不得不借助于闽商,并谋求与闽商建立良好的关系,广州十三行成为承担中英贸易的主要机构,拥有十三行极大控制权的闽籍商人,在此后的中英贸易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十三行作为半官方商业团体,不仅包揽了来华中外贸易,而包括闽籍洋商在内的十三行行商有时还充当中国政府的官方代理和中英贸易的中介。大的行商常为传达外贸主管机关粤海关或地方官府的规定,拟定半官方性的公函。在官府眼中,洋商是外商的代理人,要为外商的不法行为负责。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则把洋商看作是官商,由洋商们分别包揽商船的进出口贸易,使公司

的生意比在其他地方方便好做。闽籍洋商不仅在中英贸易中扮演中介的角色,同时也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使者。商业的沟通从来就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十三行行商作为清政府与西方人联系的纽带,在长期的涉外活动中,成为认识和吸纳西方科技文化的先行者。

香港早期闽商势力的崛起,基本上是和香港开埠、逐步演变为远东转口贸易商埠的整个历程同步展开,并互为动力的。1841年1月28日,英国人强占香港岛,6月7日宣布香港为自由港。比邻地区的闽人随即相继涌入,大量内地居民的涌入致使这个原来只有数千人的小岛人口急剧增加,到1884年时,它已经成了数以十万计华人移民的谋生地,一个崭新的、人口众多的、多族群的、城市型的华人社会形成。在香港的商业圈中,福佬籍贯的商人历来都是一支主力军。尤其是在“南北行”建立前后,除本地族群的商人外,当时香港的其他杰出华商大多出自福佬族群。因此,香港政府除尤其重视本地族群的行商等以外,对福佬族群也青睐有加,曾经做出一些特别的安排,以便吸引福佬商人来港经商。19世纪下半叶,随着闽籍港商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为了联络同乡情谊,更进一步团结在港闽人的力量,要求建立统一的闽人组织的呼声日益高涨。1893年,香港最早的福建人社团榕庐会所成立,起初为福建海员提供短暂住宿之用,在香港岛的称为三山别墅,在九龙的称为闽庐会所,其后两者扩大合并为榕庐会所。此后,旅港福建商会、旅港福建体育会、旅港福建学校、旅粤泉漳会馆、旅粤汀龙公所、旅粤福建会馆、旅粤鹭航会馆、旅港福建同乡会等闽籍社团陆续涌现。19世纪下半叶是包括闽商在内的华商初次崛起的时代,华商在转口贸易方面依靠金山庄、南北行成功地成为香港贸易最重要的角色。不仅如此,闽商和广商共同将香港纳入了华南(福建、广东、广西)—香港—东南亚的华侨贸易圈中,成为明清以来东亚贸易网络上的重要一环。在经济进步的同时,闽商也积极建立自己的商会、同乡会等组织,力图在香港的政治生活圈中冲破英国人的束缚,发出自己的声音。

民国成立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贫者感生计之困难,富者苦兵匪之蹂躏,纷纷携眷逃往香港,其中不少人开始在港投资创业。此外,这一时期,广大华侨回国投资的风潮方兴未艾,香港因其独特的地理、交通位置和优越的港口、商贸环境,成为侨商们选择投资兴业的桥头堡,而这其中闽籍商人占据相当比重。他们所选择的投资创业领域涉及银行、证券、轮船、酒店、树胶等行业,其中尤以银行业的发展最为突出。

二战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经济发展的需求,大量的海外闽籍华侨及大陆福建居民陆续迁至香港。新移民的到来,不仅为香港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而且带来了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和技术,改善了人口结构,延缓了人口老龄化。据统计,目前香港闽籍同胞120万人,约占香港总人口的1/6,现有闽籍社团组织130多个。其中包括旅港福建商会和同乡会、体育会、联谊会、宗亲会、校友会、希望工程基金会、经济文化艺术研究团体等。这些在港闽籍社团不仅是一支积极活跃、团结向上、拼搏创业、爱国爱港爱乡的重要力量,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闽港经济文化合作交流的重要桥梁。在港闽籍社团不仅为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做出了极大贡献,而且在联络乡谊、服务乡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的福建社团,自创立之初就一直与内地保持密切关系。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从此拉开。1979年,党

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福建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福建的开放，进一步密切了闽港间的联系。随着开放进程的不断加深，在港闽人的数量与比例也在不断增加。据统计，香港回归前，香港闽籍同胞有80多万，占香港总人口的15%；如今已增至120万人，比例也达到1/6。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港闽籍同胞为香港的繁荣发展，为“九七”之前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香港闽籍同胞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闽籍商人作为仅次于粤籍的主要群体，对香港当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不仅积极涉足加工制造业、房地产业、金融业、服务业等经济领域，还热心参与政党组织、地方选举、慈善事业等公共政治活动。同时，香港闽商还通过组织文化社团、设立学校、开办移民课程等方式，来帮助新移民增强适应能力，加强同乡情谊，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闽商在中国内地的投资逐步从广东、福建向“长三角”及内陆地区拓展，呈现出“北上西进”的发展趋势，中西部地区吸纳港资的数量稳步增长。从投资金额来看，香港闽商在大陆的投资呈逐年递增态势，尤其是对“长三角”及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增幅较大。从投资模式来看，香港闽商在大陆的投资逐步由“前店后厂”的制造业主导模式转向电子、金融、地产、贸易、服务多元化的市场导向模式。香港闽商的投资，不仅为内地经济发展注入了大量资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经验，有效促进了内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香港闽商还充当内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交流贸易的桥梁，极大地推动了内地的国际化进程。此外，香港闽商在内地的投资、交流与合作，也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带动了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了香港与内地的双赢。

目前，香港闽商企业发展存在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方面，香港自由、开放的经济环境和内地广阔的腹地，为香港闽商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香港闽商广泛的经营领域、高标准的经营方式和前瞻性的经营理念及闽商自身勇于拼搏的精神，为其企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香港闽商在高科技创新产业方面的发展仍面临不足。以科技、知识创新为主导，发展以金融业、会展服务业、创新科技资讯应用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医疗保健服务业和教育培训业为支撑的知识型创新产业，成为未来香港闽商企业发展的新方向。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香港开埠与晚清香港闽商/1

第一节 开埠前的香港与闽商/1

- 一、宋元闽人在亚洲地区的海路网络/2
- 二、宋元闽人海上活动与香港早期聚落/5
- 三、大航海时代下的东亚海洋贸易圈/9
- 四、英人在东亚的贸易及其与闽商的关系/13

第二节 香港开埠与闽商/17

- 一、开埠前的香港地区/17
- 二、英国割占香港岛与香港开埠/22
- 三、香港开埠与在港闽商的发展/26

第三节 开埠后的晚清香港与闽商/30

- 一、19 世纪后半叶香港的发展/31
- 二、香港的转口贸易和闽商/36
- 三、华人社会组织与闽商/42

第二章 民国时期香港经济与闽商/47

第一节 1911—1925 年香港经济的持续发展/47

- 一、战争对香港转口贸易的影响/47
- 二、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及华南财团的崛起/48
- 三、香港的填海工程/56

第二节 1925—1945 年香港经济的曲折发展/56

- 一、省港大罢工与香港经济的跌落/57
- 二、大萧条与华资银行的沉浮/59
- 三、香港工业的发展/61
- 四、香港沦陷与日本的经济掠夺/62

第三节 战后香港经济的恢复/64

- 一、港英军政府对香港的统治/64
- 二、港英政府的经济恢复政策/65

第三章 闽人移港与闽商社团/68

第一节 海外排华事件与闽人移港/68

一、在港英政府与新中国之关系/69

二、闽人移港/75

三、闽人在港社团及其功能/84

第二节 战后香港经济的发展与闽商的商业活动/92

一、战后香港经济的发展/93

二、战后闽商的经营活动与在港闽资企业/96

第三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的闽人在港/103

一、香港闽人新移民的数量分析/104

二、新移民群体的多元类型及特征/106

三、福建籍同乡会的分化和整合/109

四、闽籍移民聚居区与社区文化——以北角为中心/112

第四节 闽商社团之组织架构与个案分析/115

一、旅港福建商会/115

二、香港福建社团联合会/123

三、香港泉州慈善促进总会/126

第四章 闽商与当代香港社会/130

第一节 香港经济转型与闽商产业/130

一、闽商与香港发达的加工业/130

二、闽商与香港文化事业/134

三、回归前后的香港闽商经济/137

四、香港经济国际化与闽商机遇/140

第二节 闽商与当代香港社会政治/144

一、闽商与推动香港回归祖国/144

二、闽商与香港地方选举及公民政治/147

三、闽商与香港社会慈善活动/149

第三节 闽商与香港的中华文化遗产/152

一、香港福建同乡会的爱国爱港爱乡情怀/153

二、香港福建体育总会文化追求/156

三、香港福建中学与人才培养/159

第五章 香港闽商与祖国社会经济繁荣/164

第一节 香港闽商和福建经济建设/164

一、香港闽商的乡土情缘/164

- 二、香港与福建的经济互补/167
- 三、香港闽商与福建改革开放 30 年经济/170
- 四、香港闽商与海西发展战略/175
- 第二节 香港闽商与“大珠三角”经济发展/178
 - 一、香港闽商与港深发展/178
 - 二、香港闽商与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182
 - 三、香港闽商在“珠三角”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6
- 第三节 香港闽商的其他内地投资/189
 - 一、香港经济的持续发展与香港闽商产业优势/189
 - 二、香港闽商在内地各省区/193
 - 三、香港闽商的前景/196

参考文献/200

后 记/207

第一章

香港开埠与晚清香港闽商

香港,这个东方之珠日益放射出璀璨的光芒,并非只是英国殖民者的功劳,而是世代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胼手胝足、辛勤耕耘、经商的贸易的结果,这其中,闽人的贡献尤其值得关注。因为闽人是较早涉足海洋的族群,也是较早打通商业贸易渠道的族群,在闽人构筑的海洋贸易航线上,香港是一个重要的商业纽结,滨下武志先生对香港“腹地”的分析显示:香港的国际商业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之奠定,都多多少少浸润着闽商的运行伟业。

早在宋元时期,闽人已经开始较大规模移居香港,新移民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香港早期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世界历史进入大航海时代,闽人成为亚洲海域贸易的重要参与者,香港亦成为东亚海洋贸易网络的重要一环。随着香港贸易地位的日益凸显,英人开始觊觎香港。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导致了英国对香港的侵占和近代香港的开埠。英国占领香港地区以后,当地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在开埠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香港闽商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节 开埠前的香港与闽商

自宋代开始,大批闽人纷纷出海贸易,他们的足迹东至日本,南至南海诸国,北至高丽,形成了巨大的海上贸易网络。作为闽商赴南海各国贸易重要途经地的香港,逐渐被发现和认识,并吸引了大批闽人迁居至此,新移民的到来不仅为香港早期聚落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制盐、采珠、种香、航运等早期香港经济的发展,带动了香港文化的丰富和繁荣。

明清时期,统治者一改宋元时期宽松的海外贸易政策,推行官方控制下的朝贡贸易体制,厉行海禁政策,严格限制民间海外贸易发展,处在夹缝中的福建海商依然能够冲破重重阻碍,远赴东西洋各国,建立起亚洲海域的贸易网络。与此同时,欧洲迎来了全新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欧船队开赴世界各地,以海洋为航线,以帆船为交通工具,建立起世界各地的紧密联系,并派使者和商人屡次到达中国东南沿海,试图叩开中国的贸易大门。后来居上的英国,在东印度公司的积极经营下,其势力在亚洲

海域迅速扩大,并最终于1842年占领香港岛,开始其一步步侵略中国的步伐。

一、宋元闽人在亚洲地区的海路网络

闽人,自古即有善贾习俗,且具有悠久的航海历史传统;闽商,作为一个地方商帮,在唐宋五代时期就开始形成。早在10世纪初,这批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偏远地区且与外界隔绝的居民,就已经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根据中国古代典籍记载,闽人在海外积极经商,其足迹遍布北起高丽、南至苏门答腊岛的东西洋各商埠。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部分长期在外经商的闽人开始旅居国外,有的甚至长期侨居异国。由于闽人的适应力极强,他们很快便能融入当地社会,依靠各种制度化安排的机制来保护或促进其商业利益的发展。这些背井离乡的闽商侨居群体在亚洲海域诸港埠逐渐地发展壮大,构建起巨大的族群关系网络和海路贸易网络。

自北宋至元,在宽松的海外贸易环境下,闽人出海贸易的国家和地区逐步增多,贸易范围日渐扩大。早在唐代,闽商已与阿拉伯及南海商人有商贸往来。五代后期,闽人(尤其是闽南商人)争相出海贸易,时人黄滔的一首《贾客》生动描述了闽商不畏艰险、随波逐利的生动情形:“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入宋以来,闽人出海贸易日趋频繁,史书对此记载也日渐增多。《文献通考》、《夷坚志》、《宋史》等史书对闽商的贸易足迹皆有记载,但较为零散。例如,《夷坚志》记载“泉州僧本称之兄为海贾赴三佛齐”,《宋史》亦载: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从上述史料记载可见,闽商的贸易范围远至高丽及南海各国。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赵彦卫的《云麓漫钞》系统记载了福船所到达的地区,据记载当时福建市舶司的船舶常到的国家和地区有31个:大食、嘉令、麻辣、新条、甘秬、三佛齐、真腊、三泊、绿洋、登流眉、西棚、罗斛、蒲甘、渤泥、阁婆、占城、日丽、木力千、胡麻巴洞、宾达浓、新洲、佛罗安、朋丰、达逻啼、达磨、波斯兰、麻逸、三屿、蒲哩噜、白蒲迤、高丽。^①据曾任泉州市舶司提举的赵汝适所撰《诸蕃志》一书记载,南宋时期与福建有通商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达58个。总的来看,宋代福建海外贸易到达的国家和地区有:东亚诸国,主要是高丽和日本;南海诸国,即今东南亚地区,包括中南半岛诸国、印尼、菲律宾,主要有占城、真腊、罗斛、三佛齐、阁婆、兰无里、凌加斯加、渤泥、麻逸、三屿等国;南亚诸国,自南海诸国往西,是印度次大陆,当时称为“西天诸国”,在今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一带有南毗国,奎隆一带有故临国,在今印度东南部沿海有注犍国,今孟加拉有鹏茄罗国,今斯里兰卡有细兰国等;阿拉伯诸国,阿拉伯在宋代称为“大食”;非洲、欧洲诸国,与阿拉伯半岛相连,地处北非的易斯里遏根陀(今埃及亚历山大港)、默伽猎(今摩洛哥),东非海岸的层拔(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弼琶哆(今索马里柏培拉)、昆仑层期(今马达加斯加岛)以至欧洲的斯

^①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船舶》,清咸丰涉闻梓旧本。

加里野(今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国家。^①至元代,福建对外贸易的范围又有很大扩大,与福建有关的国家和地区多达近100个。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中所涉及的海外国家几乎皆与福建有贸易往来,正如《闽书》中所言:“志所载凡百国,皆通闽中者。”^②

宋代是中国海外贸易发展十分活跃的时代。居于东南沿海的福建,作为两宋时期重要的经济区域和海外贸易重镇,在宋代海外贸易版图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宋人苏辙即言:“长乐大藩,七闽之冠;衣冠之盛,甲于东南。工商之饶,利尽南海。”^③两宋时期,通过海路同福建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东起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南至南洋群岛,西到阿拉伯半岛乃至东非海岸,都有福建商船的航迹,闽商在海外贸易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日益突出,逐渐成为国内沿海商人的代表。

两宋时期,闽人的出海航路有南海航路和东海航路两条。南海航路通达南太平洋西部及印度洋地区诸国,港口贸易以泉州、广州最为繁盛。作为闽人重要出海港口的泉州位于福建东南海边,为江海交汇之所,有优良的港湾。海上交通线入宋以来日益发展,空前繁荣。当时泉州与各国的海上航线主要有以下几条:(1)由泉州入海,经西沙群岛(时称万里石塘),至占城,然后可再往三佛齐、阁婆等地。据《诸蕃志·占城国》载,自泉州至占城,顺风20余日即达。(2)自泉州起航,经南海,过三佛齐,越马六甲海峡,至天竺的故临,然后可往波斯湾。南宋时,泉州与波斯湾之间,商船往来不断。按《诸蕃志·大食国》记载,从泉州到大食,往返大约需要两年时间。至波斯湾后,再沿阿拉伯海岸西南行可至亚丁湾和东非沿岸地区。(3)从泉州出航,取道南海,过占城,绕渤泥,而后可抵麻逸、三屿(菲律宾各岛)。明中期以后,才由泉州经澎湖、台湾直通菲律宾。^④东海航路通往高丽、日本,重要港口有明州(今宁波)、临安(今杭州)等。闽南商人多经东海航路远赴日本、高丽经贸易。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在其所著的《荔枝谱》中记道:“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赴高丽的中国海商主要为闽商,而非在地域上更为临近的浙商。1138年之后的数年间,闽商与高丽王国之间的海上贸易步入了繁荣时期。可以确认的是,1147—1152年的6年间,共有16批中国海商前往高丽贸易,总人数达到1332名。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人是闽南商人。^⑤

两宋时期,福建沿海的贸易虽已十分活跃,闽人的出海航路也已开辟,但泉州名副其实地作为南海贸易的中枢港繁荣起来却在南宋以后。元朝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统治者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因此元代海外贸易出现了空前的蓬勃发展。汪大渊在《岛夷志略·自序》中曾言:“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

① 胡沧泽:《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② (明)何乔远编撰,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闽书》校点组点校:《闽书》第5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62页。

③ (宋)苏辙:《栞城集》卷三十,《林积知福州》,四部丛刊景明嘉靖蜀藩活字本。

④ 仇宇浩:《宋代海外贸易》,《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

⑤ 钱江著,亚平、路熙佳译:《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

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深,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者,如东西州焉。”寥寥数语,元代中国海外贸易之盛况已跃然纸上。元代之前的海外贸易“大率夷人入市中国”,而到元代,形势为之一变,以闽商为代表的中国海商异军突起,一跃成为海外贸易的主人,并且执中国与印度之间海上航运的牛耳,甚至远航“回回田地”,足迹遍及西太平洋、印度洋沿岸。^①

宋元时期,福建的海外贸易之所以如此繁盛,福建海商之所以能够远渡重洋,构建起庞大的贸易网络,皆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密不可分。两宋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海外交通的空前发达和造船、航海技术的巨大进步,则为私人航海开展贸易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及至元代,社会上经商风气很盛,上自皇室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都普遍从事商业活动,而且元代海陆交通发达,海外人士大量进入中国,他们除了做官之外,大多都以经商为业。除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及经商风气盛行对海外贸易的推动外,福建人多地狭的社会现实,迫使诸多百姓不得不出海经商,寻找新的出路。福建的地理环境,政府的贸易政策,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及闽人的擅贾传统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其一,背山面海的地理环境。福建背山面海、山岭环绕,是一个陆域环境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单元,但“闽在海中”,即意味着福建这个华南沿海省份的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与海上活动密不可分。汉唐以后随着航运技术的发展,海洋成为闽浙、闽粤等地及海外交往的有利条件。从地理位置来看,福建是我国大陆通往台湾、日本、东南亚、大洋洲、中东及西非等地最便利的出海口之一。福建境内重峦叠嶂,山地丘陵面积占80%以上,素有“东南山国”之称。我国东南一带海拔1000~2000米的高峰几乎都集中在福建境内。这种地貌使福建耕地资源比较短缺,种植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随着人口增长,自南宋以来就出现了粮食短缺问题,北依浙江的温、台,南赖广东的惠、潮,西贩江西、湖广,这是福建传统的粮食进口办法,而后从台湾、东南亚进口米粮更成为一条主要渠道。^②可以说,福建的“特殊环境与历史条件不仅促使该地区海商的孕育,而且规定了该地区海商的发展道路”^③。可以说,自然环境是福建海商崛起的重要因素和基础条件。

其二,宽松的海外贸易政策。宋元时期,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海外贸易发展。“通洋裕国”被列为国策,在官方的鼓励下,“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闽船、闽贾活跃于亚洲海域。元祐二年(1087年),政府不仅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还推行了诸多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一是加大政府采购力度,积极扩大海外贸易额。二是采取种种措施扶植、奖励发展民间贸易,甚至用“补官”、“转(升)官”来奖励成绩突出的舶商和市舶官员。三是弛禁舶货贸易。^④南宋还特许前来贸易的蕃舶,只要经过市舶司

① 廖大珂:《元代私人海商构成初探》,《南洋问题研究》1996年第2期。

② 王晓文:《试析历史地理环境中福建海商的兴衰》,《经济地理》2003年第5期。

③ 陈支平、詹石窗:《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5页。

④ 王侠:《宋元福建对外贸易发展及原因初探》,《中国市场》2012年第36期。

“抽解和买入官”后,其余物品可以在福建境内自由买卖。宋元时期相对开放、宽松的海洋政策极大地推动了闽商的海外贸易发展。

其三,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由来已久,早在三国时期孙吴就在闽中设典船校尉,专门督造船只,并设温麻船屯于今霞浦故县。宋元以来,福建一直是中国海船,尤其是远洋海船的制造中心,造船技术相当精良,所造的“福船”代表了福建乃至中国木帆船造船业发展的巅峰,时人曾言:“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①当时,海运业也逐渐掌握了帆、桨、舵等操船技术和指南针、航海图、天文航海及海洋、气候预测等航海技术,帆、桅、橹、桨、篙、舵、锚等齐全的航器设备也是航海技能提高的明证。在轮船出现以前,福建的木帆船航运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东非沿岸以东的广大海域任由福建的海商、舟师们纵横驰骋。^②高超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成为福建海商赖以驰骋天下的利器,为扬帆远洋提供了技术保证。

其四,闽人的擅贾习俗。闽人自古即有高昂的经商热情,具有相较于传统社会“重末轻本”的社会风气,唐人独孤及称“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货产利,与巴蜀埒富,犹无诸、余善之遗俗”^③。此外,闽人不惧艰险、孜孜求利的商业性格,有力保障了其在贸易竞争中的优势。在海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福建商帮融入了较农业民族更为丰富的性格内涵。他们摆脱了株守故土的观念,或下海以商,或外出为工,具有了一种义无反顾、无远弗届的流动性格;他们在与海洋打交道的过程中亦培养了积极的冒险性格;他们在与外界的交往中衍生出开放的性格。^④换言之,福建商帮在浓厚的商业气氛中发育、成长起来,以流动、冒险、开放为特征的商人性格日益压服了定居、苟安、封闭的农业社会品格,进一步开拓和保障了自己的海外贸易发展之路。

二、宋元闽人海上活动与香港早期聚落

宋代以来,被称为闽商、闽贾、闽船的福建商人们的活动,开始为社会所注目,^⑤尤其是福建海商的活动显得日益重要且日趋活跃,其足迹遍布北起高丽、南至苏门答腊岛的东西洋各商埠。就东南亚的贸易中心而言,占城、安南、爪哇等地皆是闽商最为青睐的商埠。古代的汉文典籍经常提及这些穿梭于南海诸国的闽商。992年,福建建溪富商毛旭率领一个朝贡使团从阇婆国(位于今爪哇岛)远航而来,之所以如此,皆因毛旭经常前往爪哇贸易,与该统治者私交甚笃。14世纪30年代,汪大渊附舶泛海,与闽南商人一行

① (宋)吕颐浩:《忠穆集》卷二,《论舟楫之利·上边事善后十策》,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王晓文:《试析历史地理环境中福建海商的兴衰》,《经济地理》2003年第5期。

③ (清)冯登府:《闽中金石志》卷一,《成公李椅去思碑》,民国希古楼刻本。

④ 林枫:《明清福建商帮的性格与归宿——兼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⑤ (日)斯波义信:《宋代福建商人的活动及其社会经济背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

航抵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在当地获悉昔日泉州曾有一吴姓家族率乡族百余人,发舶前来该港埠贸易。同样的情况亦发生在位于今越南中部沿海的占城。1166年,有一位名为陈应的闽人头目,率领了五艘帆船与占城当地商民市易。这支贸易船队于翌年返回福建,船上除了满载的乳香和象牙之外,还有一个占城国王派遣的朝贡使团。之后不久,又有两批闽南商人,分别由吴兵和陈应祥带领,前往占城经商贸易。

除了东南亚的众多港埠及商品集散地之外,北宋中期以后,高丽这个东亚地区极富影响力的王国及贸易中心也同样是闽商往来贸易的重要之地。根据高丽历史学家郑麟趾的记载,在当时前往高丽贸易的宋代商贾中,闽商是经营高丽贸易最重要的生意伙伴和最大的商人群体,而且几乎每年都有一批来自福建泉州的商人航抵高丽。在某些年份,赴高丽贸易的闽商人数甚至达到数百位之多。据郑麟趾《高丽史》一书所载数字显示,仅1012—1192年间,就有117批宋朝商人前来高丽贸易,总人数高达4548人,^①且这些商人大部分来自福建,特别是福建南部的泉州。

远赴海外诸国贸易的闽商,除贩运商品外,有时还扮演中国与外国之间外交信使的角色。例如,1068年,两名泉州商人黄慎和洪万来,受宋王朝的派遣,携带宋神宗的密函前往高丽,表明宋朝希望与高丽王国建立友好外交关系的意愿。黄慎和洪万来在高丽朝廷受到了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翌年,他们带着高丽王国礼部的正式答复返回泉州。根据中国史料的记载,黄慎在1070年被再次派往高丽,但他第二次出访高丽的目的却只字未提。鉴于1068年恰好是赵顼(即宋神宗)的登基之年,很有可能是这位新登基的皇帝急于要为宋王朝在亚洲区域打开一个外交新局面,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外部新环境。然而,朝廷却苦于找不到可以直接与高丽王国进行沟通交流的外交渠道,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经常往返泉州和高丽之间的闽商,使其作为信使,为两国之间的官方交往传递重要信息。^②远赴高丽贸易的闽商,不仅作为中国的信使,同时也帮助高丽王国向中国传递信息。1075年,一个名叫傅旋的泉州商人携带高丽王国礼部的公函,传递高丽希望借用中国的朝廷乐师到该国宫廷去表演的愿望。此外,高丽朝廷有时还委托闽商代为在中国购买书籍等商品,泉州商人徐戡即是其中的代表。徐戡因贸易缘故频繁往来高丽,故与高丽王室熟稔,高丽朝廷曾委托他到杭州的印刷作坊,为其特别印制夹注《华严经》近3000件,徐戡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委托,且得到了大批赏银。

在大批闽人远赴海外经商的同时,亦有不少人迁居香港,内地新移民的到来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制盐、采珠、种香、航运等早期香港经济的发展,而且带动了香港文化的丰富和繁荣,为香港早期聚落的形成和扩大奠定了重要基础。闽人迁居香港地区的经过,宋代以前已难以考证。香港地区生产海盐、莞香、珍珠,航运业发达。北宋时期因中原战乱的影响,不少人从中原迁居这一地区。现今新界的五大族:锦田邓族、新田文族、上水廖

^① 钱江著,亚平、路熙佳译:《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② 钱江著,亚平、路熙佳译:《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